



.....全裸的女人照片

不影響汽車交通，而台北中華商場後面的縱貫鐵路，每隔幾分鐘就有火車通過，這對交通頻繁的西門鬧區，實在影響甚巨也。

世界最高的鐵塔—東京鐵塔高達333公尺，比巴黎鐵塔還高，但氣派就差多了，四周都給建築物包圍著，沒有寬敞之感，要上鐵塔非搭電梯不可，看台分兩層，一層在鐵塔半腰部，在此處可鳥瞰東京都全景，再上頂層，更可見郊區景色，遠者可看到羽田機場、橫濱與富士山。塔內有遊樂場與臘像館，館內陳列有本世紀政壇上風雲人物之蠟像，除了參加開羅會議三巨頭—蔣公、邱吉爾首相與羅斯福總統外，還有甘迺迪總統、印度總理甘地、也有毛匪澤東及胡志明之蠟像，做得唯妙唯肖，栩栩如生。

皇居—明治天皇居所，佔地有幾十甲大，由於佔地過廣，曾引起東京市民的示威遊行，要求縮小皇居範圍，但目前仍維持現狀。除了內宮禁止參觀外，外宮可供人遊覽，四周有護城池，每個門都有警衛，一進入大門就可發現城牆都用巨石很整齊地排列著，非常好看，牆內除了警衛辦公廳及一所專門訓練皇警的建築物外，儼如一座公園。時時可見皇警巡邏車在附近巡邏，據說曾有一年輕日本人偽裝送魚者進入皇宮，幸經警衛及時發現車內載有炸彈而加以逮捕，否則，就要有改寫歷史的慘劇發生。

東京都公園及動物園很多，以上野公園最有名。上野動物園裡面除了許多台灣見不到的珍禽異獸外，最令日本人珍惜的是一對熊貓，黑白相間，非常可愛，有如玩具熊，性喜寒冷，而且量少。

戰前東京鬧區是銀座，除了商業街外，最著名是歌劇院，但目前已漸趨沒落，不是演些外國影片外，就是以跳無上裝歌舞為號召。日本對於性較開放，電視、電影或歌劇院，只要保留最神秘部位外，其他都合法而不致遭取締，所以在日本到處可見無上裝廣告或電影。性

在日本已達泛濫的地步了，在雜誌攤上，每本書前兩頁都是幾乎全裸的女孩照片，我發現日本不論男女老少都視若無睹，大概是見怪不怪了。戰後鬧區已給新宿取代了，目前新宿是日本最熱鬧的商業區，除了高樓櫛次外，大百貨公司到處可見，有些百貨公司側門直接與地下鐵道連接，以利顧客乘車，什麼東西都齊全，但價錢並不便宜，尤其服裝類比台灣貴多了，質料也不見得好多少。

郊區，最值得去的就是東京外港—橫濱，在橫濱可見各色人種，在中華街前有一條可說是西洋街，櫥窗擺設都有西洋味道，物品都是舶來品，在該處可買到歐美最流行的服裝及小飾物，而中華街最大特色就是飯店多，一百多公尺長的街道，有一半是飯店，每個飯店幾乎都陳列有台灣的紹興酒與貴州的茅台酒，除飯店外，有百貨店、藥店，在百貨內可買到大陸人民公社的農產品如紅棗、花生糖、肉罐頭，也買得到台灣的土產，令人興奮的還有售新竹的米粉呢！另有土產店，有來自先進國家的藝術品也有來自非洲落後國家的手工藝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短短的二十五天，轉眼即逝，雖未能清楚看清日本真面目，但以一個觀光客在短時間內所看到的日本，已沒有軍國主義與武士道精神的偏激思想，處處充滿了進步向上的氣氛，不愧是亞洲的經濟大國，若非日本是缺乏資源、人口及受各種自然條件限制了日本的發展，那將是不同凡響。若我們不能奮發振作，充份發揮中華兒女潛在能力的話，地位將會有受威脅的危險，我們能不謹慎嗎？

二月十九日搭巨無霸波音747型回國，在機上各色人種都有。現在回來台灣了，希望能藉貴刊一隅把出國所見諸事刊出，真有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之感。我想那天有機會還要海濶天空一展羽翼，遨遊四海的。

趙元任與羅素 ——在中國



russell

我在美國從事研究工作十年後回國，恰好羅素先生也在其後的一個月內踏上了中國的土壤。本來我回國的主要原因乃是要在北京清華大學開數學和物理二門課。在1920年8月19日，也是我到達上海的第三天，當時的主辦單位乃是一個由進步黨所組成的演講學會，邀請我為羅素先生的演講作翻譯。由於進步黨是由梁啟超、蔣百里、傅偁等政治上的風雲人物所組成。胡敦復、胡明復二兄弟及胡適之先生就

會為此警告過我不要成為用以增強政黨爭權望的工具，雖然他們以為羅素的演說政治上的意味很濃厚，但我還是答應了。清華大學的全校長在詢及羅素有關我翻譯的專項時，羅素立刻同意，並且建議我不要離開北京城以便聯絡。事實上，這個演講學會恰好是在於北京城內成立，且是我於清華大學授課屆滿一個月的前幾天。我在十月十三日就動身前往上海與羅素會晤。以下是我當天所寫下的日記：

“羅素和我由社會上一般的傳聞及照片上的形容所得來的印象十分相符，除了他本人似乎更高大強壯且有一般優雅言行舉止的氣質流露無形。看來就不折不扣的是位學者。所以我與羅素在哈佛大學裡互相熟知，做個精神與心靈交流的朋友並非難事。

在前往北京做正式的演講前，羅素和Dora Black小姐也在上海、杭州、南京及長沙等地作巡迴演講。我通常都以標準國語來為中國民眾翻譯。但由於要儘量和聽眾打成一片及我自己對中國方言的興趣，我曾在杭州以杭州地方話翻譯。而在湖南省會長沙，我就加些湖南話下去。然而有一次在長沙的演講會結束後，一位聽眾上台來問我道「趙先生，你是那省人？」他以為我是個湖南人，講國語時還帶著湖南土腔，事實上我是以國語中帶著些湖南口音來提高聽眾的興趣。有

一次譚延闓省長要求我為他的演講作翻譯，而不克參加羅素的演說。那天晚上真是星月無光，雖然羅仍以其流利幽默的風格說出智慧的結晶，而這位翻譯員却省略了最精彩的部份，只是不斷的重覆着一些無關痛癢的客套話。

到了北京以後，找房子真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我們在北京城東側找到一所房子以後，必須請來一位會說英文會話的廚師，因為我無論如何都不足以負責那種翻譯的情況。羅素和Black小姐用這所房子的北邊而我則由清華大學住處搬出來和他們同住。由於都住在一所房子裡，人們很容易以為羅素和Black小姐有不尋常的關係。雖然那時已有最具革命性、最進步的思想，以為男孩和女孩在婚前應該“見面”，但一般而言，觀念上還很保守。我自己就為此十分困擾，實際上自從由美國回來以後，我就被深深的陷入和一個我素未謀面的女孩解除婚約的困難中。為了解決這件事，我幾乎忙得團團轉。尤其當我認識一位在北京經營醫院，十分吸引人的楊小姐以後，我真是迫不急待的由郊外的清大校區搬來北京城內。

1920年11月5日，我為羅素和梁啟超的會晤作了次翻譯，這也是我首次和梁啟超見面，梁的文章對於我們這一代年青人實有莫大的影響，我也不例外。十一月七日羅素在北京第一次正式排定的演講，地點在國立北京大學的第三校區。是有關哲學的題目，而聽眾約有一千五百名。我在當天的日記寫下：

“做為一個翻譯員實在是較原始的原文演說者來得快樂得多，因為前者並可擁有來自聽眾的心靈共鳴。”

後來羅素作了多次包括心靈分析、唯心論、因果關係、相對論、傾向力及符號哲學的演講。事實上，邀請我為羅素翻譯的一項重要理由乃是我曾提出過有關邏輯的論文。羅素演講的場地就

在北京大學及師大放著，通常都有個非常大的講堂。有次我和女友楊小姐約會久了一點而大約遲到十分鐘，讓羅素無可奈何的在台上枯等。當他看到我和一位女郎一起進來時，對我輕罵道：「壞傢伙，壞傢伙。」

同時，我也為Dora Black小姐作翻譯。雖然大多是有關於我原屬外行的社會政治問題，我發現翻譯起來並不十分困難。有次在女子師範學院的廣大聽眾前，Black小姐談及未婚男子及未婚女子的講題，由於在中國男子及女子對於“結婚(marry)”這個字有不同的說法(出嫁也是結婚)，我在混淆下不小心用錯了字，好像是說成了“男人沒有丈夫而女人沒有妻子”之類，當然聽眾哄堂大笑。這位演講者正在猜疑聽眾為何這般雀躍時，我不得不對他耳語道：「現在解釋只會浪費時間，等會再告訴你原因。」

當時除了預定時間表的安排外，還有一些研究小組和學會以研究羅素哲學的目的而成立，羅素月刊也在一位朱教授的主持下出版，我自己當然義不容辭的成為會員之一且參加所舉辦的活動。我這時真是忙得分身乏術，除了處理和我素不相識的女孩解除婚約以使我能與我所真正認識並且相愛的女孩結婚這件事外，還翻譯“愛麗絲夢遊仙境”這本著作及製作標準國語唱片。如此的過度操勞，又是在嚴寒的冬天裏奔波，竟然除了常有感冒外別無大病，不可謂不是一件奇蹟。

羅素漸漸的步入經濟窘困的情況，似乎比我還壞得多。雖然他有滿腦最進步的思潮。但是他不折不扣是個標準英國紳士，穿著上連最微細的地方也十分在意，這種“好”習性使他幾乎在中國喪命。四月十四日我與他同到北京以南一百哩的保定，在那裏他對育德中學的師生們做演說時，天氣十分寒冷，惡劣極了；但他在沒有大衣禦寒下仍口若懸河，我雖穿著厚重的大衣却不住的

站在他旁邊發抖。

回到北京後的第三天，他就發高燒，請來了德意志醫院的Dr. Dipper到公使館來診病，住院後病情就開始惡化。四月廿六日對我真是晴天霹靂，首先由楊博士傳來游博士在東北作流行病調查時死於傳染病的壞消息；繼又由蘇州傳來我外祖母突然休克，幾天後去逝的惡耗。當天晚上我被醫院的緊急電話召到醫院去，那天的日記是這樣寫著：

“杜威博士交了張表格給羅素請他簽字。羅素看來十分衰弱，但似乎還十分清醒的知道他在做什麼事。他還能小聲的說「代理權嗎？」(對Dora Black說)然後伸手欲簽名，醫師本來恐怕他辦不到，他還是草草寫下B. Russell。他還能認得我且小聲叫我的姓名。他對杜威博士說道「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能和我在一起。」我和醫師聊了一陣而停留好些時候。”

第二天Dr. Esser說羅素的病情更加嚴重，但四月廿九日時Black小姐則稱羅素病情已有好轉，從此他就很穩定的逐漸康復一直到出院。恰在那時有個日本記者歪曲事實，居然宣稱羅素已仙逝，當這消息傳達羅素本人時，他笑道：「我死亡的新聞實在有嫌誇大些。」

在他復原期期間，我急於結束“愛麗絲夢遊仙境”的翻譯工作，與促進國會統一化委員會的諸委員會商，且到上海與那位我向來不知為何人的女孩了斷解除婚約的事而和我所認識且相愛的女孩結婚。在1921年6月1日，以吾友胡適及楊小姐的閨友朱小姐簽名做為證婚人，然後我倆搬到新居同住，簡單的完成了婚事。當我詢及羅素我們沒有典禮的結婚典禮是否還嫌保守些，他回答道：「這樣實在是够激進了。」

七月六日是羅素和Dora Black演講的最後一天。第二天梁啟超為他倆辦了次餞別晚會，席

間名地質學家說了一篇極佳的送別辭。

七月十一日早晨我們送別John Dewey，當天下午，羅素及Black小姐也跟著離去。

以上便是我和羅素在中國的相處經過。以後我與內人幾年內有機會與羅素碰一次面。1924年我們在Penzance見面，並且一起到他所稱為I-naccessible海灘。1939年在加州柏克萊克拉蒙特旅館有次短短的共處，他耐不住小犬撒嬌，而為他點了7-up飲料。1941年哈佛大學的Ernest Hocking教授邀請我參加他辦的午間聚餐，席上羅素報告了一篇對他十分不尋常的項目一職業介紹的調查。1954年我全家拜訪他在倫敦的住所，有幸首次拜會Edith Russel。1968年我和羅素全家人坐計程車由倫敦旅行到威爾斯的西海岸，趁著一起飲菜的時刻，我為他所給予我的俏皮話道謝；因為他在北京城出類拔萃的演講中，僅有少數談及人口問題，有篇題目是“現代中國動盪不安的厚因”。而這次我回到英國我告知他我第一個小孩出世的消息後，他答道：「恭喜恭喜！我看你被現代中國動盪不安的原因所影響了。」在他的著作中却把這句話歸於我的創作。

記得最後一次看到他的形影是他及夫人很中國式的站在門口送我們走，當我們離去時還揮著手道別直到眼界以外。他去逝後，二位女士(Dora & Edith)同時來了訊聞。

Yuen Ren Chao

Russell:

The journal of
the Bertrand Russell Archives 7:
autumn 1972.

江寒翁譯